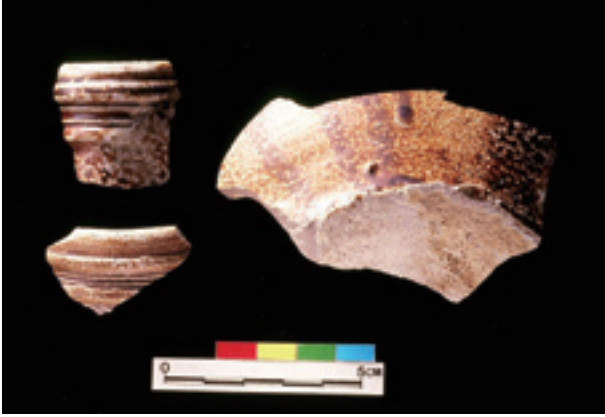


#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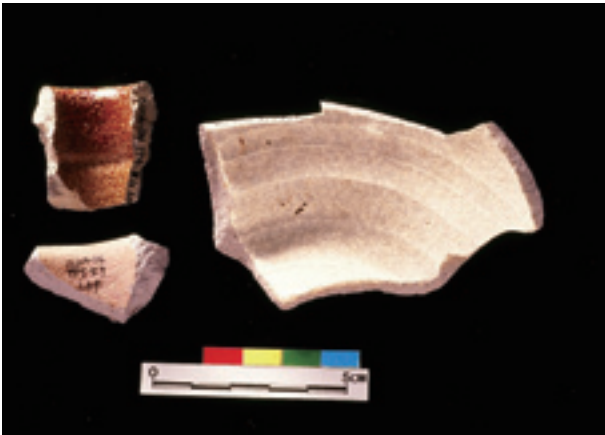
# 德國鹽釉炆器

謝明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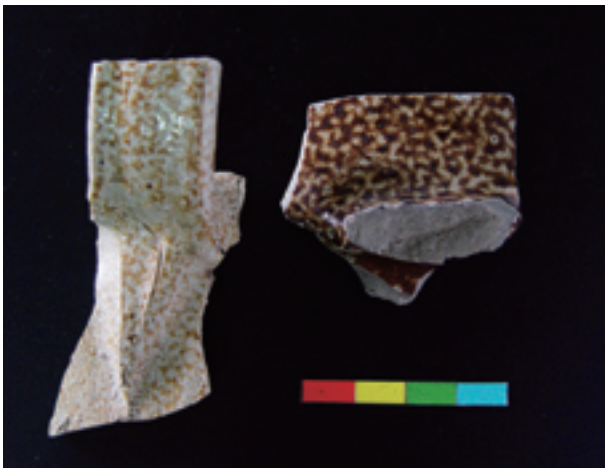
台南安平的热蘭遮城遺址的考古工作中，發現了多種的陶瓷遺物，使我們對這座荷蘭十七世紀貿易重鎮的內涵有更多認識。所謂「鬍鬚男」的鹽釉陶器，在亞洲各地迭有發現，說明海洋貿易鍊裡西方貨品向東方傳播的軌跡。而該類陶器的年代或也可做為遺址年代的參考。



圖一a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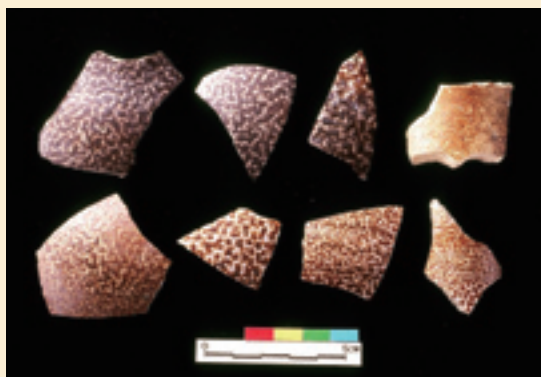
圖一b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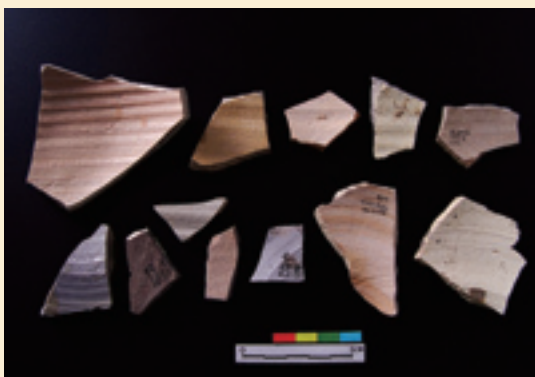
圖二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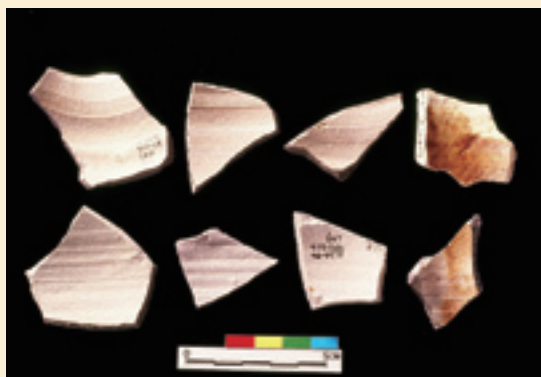
圖四a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三a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四b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內面）



圖三b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內面）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來自德國萊茵（Rhineland）地區窯場所燒製的鹽釉陶瓷標本計六十餘件，分別出土於第一、三號及五、七號探坑。從標本的造型或裝飾特徵可知，其器形包括了口沿（五件）、底（五件）（圖一）、把（五件）（圖二）和器身（四十八件）（圖三）等部位殘片。後者器身殘片當中計有十件貼飾陽紋印花，其中二號探坑所出兩件貼花標本上方另塗飾鈦藍彩斑。類似的鈦藍彩飾也見於無貼花裝飾的器身殘片，如七號坑出土的標本即點飾稀疏的鈦藍斑點（圖四），而五號坑出土的口沿殘片亦見不規則的鈦藍彩飾。

依據遺址出土標本的器式和裝飾特徵，可以復原得知其均屬俗稱鬍鬚男（Bartmannkrug, Bartmann）的帶把酒壺。酒壺以輻轆拉坯成形，壺頸肩部飾浮雕落腮鬍人面，同時經常於顏面下方

以及壺腹側面裝飾各式紋章，鬍鬚男一名即來自壺頸肩部部位裝飾的據說是表現希臘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os）人面圖紋。作品的製作工序是：於拉坯成形的器身飾模印貼花，而後整體施抹一層褐色化妝土，待入窯燒至約攝氏一千兩百度高溫時，投鹽入窯，以氧化焰燒成。如此一來，鹽與自然灰就結晶形成所謂的鹽釉（前田正明，一九八〇）。

德國萊茵地區「鬍鬚男」樣式酒壺延續至近代仍有燒造，但主要燒製於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當中又以科隆（Cologne）及其近郊的弗勒亨（Frechen）等兩處窯場製品最為著名。一般而言，科隆類型之浮雕顏面生動，表情誇張，同時又於壺身貼飾華縟的浮雕植物花卉；弗勒亨類型的浮雕貼花則顯得簡略，多數作品除了人面下方或壺腹兩側的紋章貼花之外，留白無其他裝飾。此外，同樣位於萊茵地區



圖五 印尼 Bantan 遺址出土



圖六 日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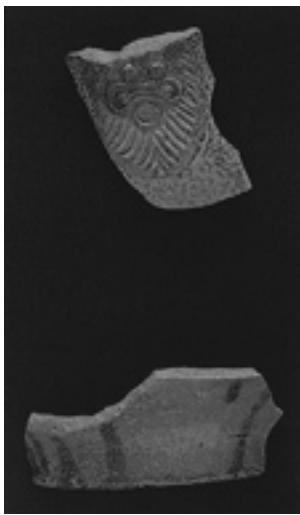
圖七 印尼 Pasar Ikan 遺址出土



圖八 1613年 Witte Leeuw 沈船打撈作品

的衛斯特維德（Wasterwald）窯場作品則又多加飾鈷藍彩（David Gainster, 1997）。雖然熱蘭遮城遺址亦見數件鹽釉鈷藍彩飾標本，但其胎釉特徵則和弗勒亨窯場作品一致，特別是熱蘭遮城遺址所出於模印貼花

上方加飾鈷藍彩的標本，其貼花紋飾簡略平板，與衛斯特維德窯場同類作品有較大的不同，因此可以認為熱蘭遮城遺址所出萊茵地區鹽釉炆器標本均屬弗勒亨地區窯場所生產（David Gainster, 1997; Karl Göbels,



圖九 日本興善町遺跡八尾邸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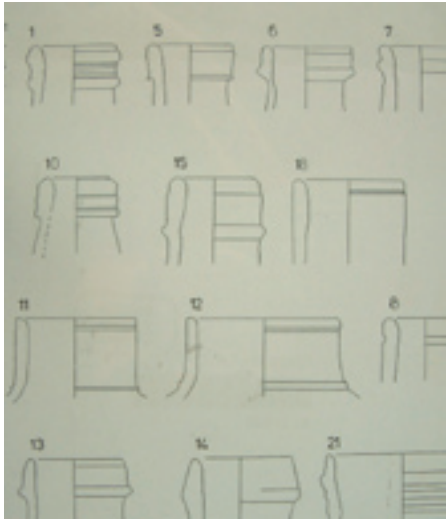
1980)。應予一提的是，印尼萬丹（Bantan）（大橋康二等，一九九九）（圖五）或雅加達沿岸叭沙伊干（Pasar Ikan）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遺址（Hasan Muarif Ambariy, 1981；三上次男，一九八二），以及日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等遺址也都出土有萊茵地區鬍鬚男酒壺標本（長崎市教育委員會，二〇〇一）（圖六）。特別是日本至西元二〇〇二年為止的多處考古遺址所出總數達一一五件（片）的標本只見弗勒亨類型（櫻庭美咲，二〇〇三）。換言之，截至目前可確認之東方遺址所出萊茵地區鬍鬚男酒壺，似乎限於弗勒亨類型，不久前公佈的台灣外島澎湖風櫃尾表採的殘片（盧

泰康，二〇〇一），也屬同一類型。另外，依據個別研究者的見聞，一九九〇年代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一帶河川曾發現包括德國鹽釉酒壺在內的泰國、越南和日本、中國等地十六至十七世紀陶瓷（中里逢庵，二〇〇六）。可惜報導中未揭示圖版，故打撈上岸的德國鹽釉器是否可能亦屬弗勒亨類型，還有待證實。

就印尼考古遺址出土該類標本的年代而言，萬丹遺址因伴出十七世紀的安平壺、卡拉克瓷、漳州窯等中國陶瓷和日本肥前瓷窯標本，故總數約四十個體的弗勒亨類型標本之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大橋康二等，一九九九）。至於叭沙伊干荷蘭倉庫群遺址出土的貼飾鬍鬚男面的標本（圖七），其面部特徵既和弗勒亨陶瓷博物館藏一六〇〇—一六五〇年代的同類作品大體一致（Keramikumuseum Frechen, A175），壺口沿的造型特徵也和一六一三年沈沒於大

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的荷蘭籍白獅號（*Witte Leeuw*）沈船打撈作品相近（G. C. Vander Pijl-ketel, 1982）（圖八），故其相對年代應於十七世紀前半。此一年代觀基本符合荷蘭人在一六一九年擊敗英方的攻擊，於叭沙伊干遺址所在地雅加達海岸構築城堡，建設新市鎮，並於一六二一年改雅加達為荷蘭族名「巴達維亞」（Batavia）之史實所反映該地區和歐洲勢力擴張的年代相符（三上次男，一九八二）。

另一方面，日本出土有該類標本的考古遺跡則限於長崎縣境內。如伴出有荷蘭馬約利卡膏藥罐的興善町遺跡八尾邸就曾出土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標本（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一九九六）（圖九），但是無疑還是以荷蘭商館所在地的出島出土數量最多，長崎市街和平戶市亦見出土例。後者平戶荷蘭商館年代下限在一六四一年，故商館遺跡出土之鬍鬚男酒壺標本的相對年代應在一六四一年之前（櫻



圖十一 Marion Merse的分類線繪圖



圖十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庭美咲，一九九九、二〇〇三）。這樣看來，目前東亞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地區燒製的所謂鬚鬚男酒壺既限於弗勒亨類型，其相對年代亦集中於十七世紀。不僅如此，其考古遺跡也都和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密切相關。如前所述，熱蘭遮城是荷蘭人自毀外島澎湖風櫃尾城堡於一六二四年拆遷至安平構築的城堡，而上述兩座城堡遺址均發現有弗勒亨類型陶瓷，這很難說是偶然，而應該說台灣出土例亦如同印尼、日本般，透露出此類德國陶瓷與荷人的緊密關連。關於這點，我們從一六〇九年沈沒於幾內亞灣南部的模里西斯號（*Mauritius*）沈船（M. L' Hour and L. Long, 1990），或前引一六一三年白獅號等兩艘荷蘭東印度公司沈船都打撈出弗勒亨類型鬚鬚男酒壺（G. C. Vander Pijl-keet, 1982），可以推測印尼、臺灣和日本等國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地區陶瓷應是由荷蘭人所帶來的。此一推測也符合以往學界推測德國萊茵地區陶瓷，

於十七世紀荷蘭社會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即荷蘭國內考古發掘已證實中世紀末期荷蘭陶瓷器用頗多是由萊茵地區窯場所輸入，而其中就包括不少弗勒亨類型的鬚鬚男酒壺（Jan M. Baart, 2002）。

如前所述，熱蘭遮城遺址所見萊茵地區弗勒亨窯場生產的所謂鬚鬚男酒壺標本計包括口沿、把和壺身部位殘片。以下擬依據器形部位先觀察其外觀細部特徵，而後結合國外現存相關遺物略做說明。

口沿殘片，計五件，可分二式。A式是先於厚壁直口上端鏤修一道不甚明顯的弦紋，從而形成上斂下豐的短直口，直口下方再鏤修兩道細凸弦紋，以下與頸部交接處再飾粗稜一周（圖十）。這一型式的口沿，相當於Marion Merse所分類的第一〇式（Marion Merse）（圖十一）。弗勒亨陶瓷博物館即收藏有不少類似口沿造型的鬚鬚男酒壺，其中包括數件約於一六〇〇—一六五〇年代燒製的作品（Keramikmuseum

直口上方鑲修出一道粗稜，粗稜下方飾陽紋細弦紋二周，以下和頸相接處再飾粗稜一周（圖十二）。這一型式的口沿，相當於Marion Merse所分類的B式（Marion Merse）（圖十一）。除了前引一六一三年荷蘭白獅號沈船之外，弗勒亨陶瓷博物館亦收藏一件具有同式口沿的一六一〇年代作品（Keramikumuseum Frechen, AT5）。另外，日本寬永十三年（一六三六）築造完成的人工島出島荷蘭商館遺址也曾出土同式口沿殘片（長崎市教育委員



圖十二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十三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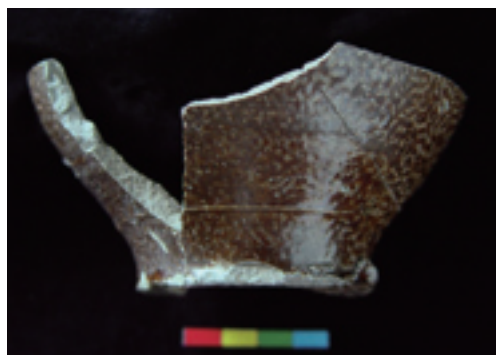
會，二〇〇一）。壺身殘片，計四十八件，其中十件飾模印貼花，另有兩件點飾鈦藍彩斑。模印貼花內容包括兩件貼飾於壺頸肩部部位的鬍鬚男面，由於以上兩件標本乃是分別出土於五號（圖十三）和七號探坑，可知是來自不同的個體。由弗勒亨窯場燒製的鹽釉酒壺所見鬍鬚男貼飾，種類極多，細部造型不一而足。雖然如此，和五號探坑出土人面貼飾所見鬍鬚樣式類似的作品以往亦曾見於歐洲收藏品（Karl Gebels, 1980）（圖十四），也和一件出土於倫敦

圖十五 英國倫敦出土  
165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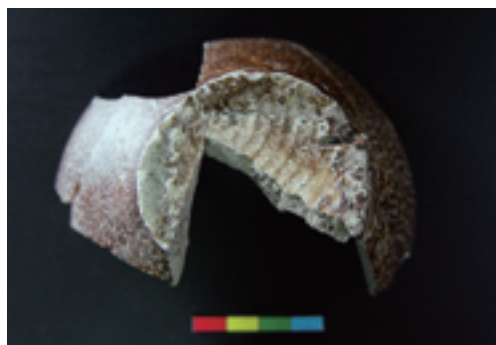
圖十四 歐洲所見鬍鬚男酒壺

燒製於一六五〇年代的作品造型特徵大體一致（David Gaimster, 1997）（圖十五）。另外，上引兩件歐洲藏品口沿均屬本文所歸類的B式，可以推測熱蘭遮城五號探坑出土的人面貼飾應屬帶B式口沿的酒壺殘片。另外，五號探坑也伴出了連底的壺身殘件（圖十六），可以清楚看出器外底的線切割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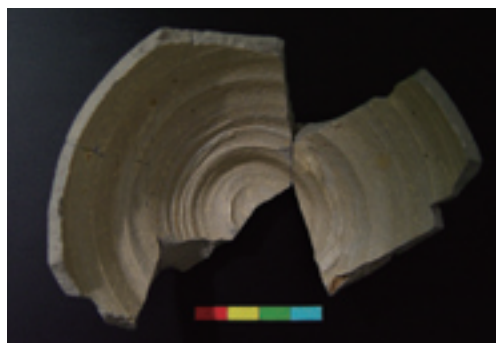
由於個人所掌握的資料極為有限，再加上部份標本



圖十六a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十六b (同上外底)



圖十六c (同上內面)

貼花紋飾不全，因此目前無法全面地辨識復原出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模印貼花的具體內容和確切的含意。比如說五號探坑出土的兩件帶有繁縟紋飾的貼花（圖十七、十八），本文就無法正確地進行比對和復原。不過，同樣出土於五號探坑的三件團花貼飾（圖十九、二十），特徵明顯，可以輕易地和國外收藏品進行比對（Karl Göbels 1980）（圖二一、二二）。其次，除了弗勒亨窯址標本之外（KMF A1006）（圖一一三），Norwich

也曾出土同類作品，後者作品據 S. Jennings 的編年，其相對年代約於一五五〇/六〇—一六五〇年之間（S. Jennings, 1981）。另外，蘇格蘭北部雪特蘭（Shetland）發現的一六五三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沈船（Lastdrager）亦見同類標本（Robert Stenult, 1974）（圖二四）。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弗勒亨鹽釉酒壺壺身貼花標本還包括第二號探坑出土的兩件殘片，其中一片飾鈷藍彩的標本，紋飾難以辨識，另一



圖十八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十七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二十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十九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二四 Lastdrager 沈船打撈標本（165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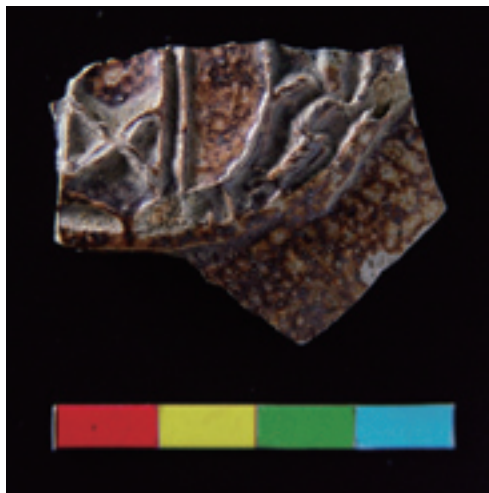
圖二三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品



圖二一 飾圓花貼飾的弗勒亨窯鹽釉標本



圖二二 飾圓花貼飾的弗勒亨窯鹽釉標本



圖二五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片則可清晰地識別出紋章主題  
乃是由「X」紋所構成（圖  
二五）。由於上述兩件標本釉  
調極為接近，且出於同一探  
坑，所以不排除是來自同一個  
體。無論如何，我們應該留  
意，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市徽即  
是由三個垂直排列的「X」所  
構成（圖二六），其分別表示  
阿姆斯特丹市的三個剋星：  
水、火和黑死病，是該市十六  
世紀以來迄今日的市徽，也是  
阿姆斯特丹市市民自我期許的  
英勇、果決、慈悲之人格稟



圖二九b (同右局部)



圖二九a Kennemerland沈船打撈作品 (1664年)



圖二六 帶有荷蘭東印度公司徽章和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麻袋(局部)

賦。若參照國外收藏之具有類似貼花紋飾的作品，可以確認二號探坑出土帶「X」形貼花標本表現的主題正是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徽。

德國鹽釉器上見到荷蘭市徽一事並不足為奇。那是因為首先出現於德國萊茵地區的鬍鬚男酒壺外觀所呈現出的詼諧裝飾趣味，深受歐洲人們的歡迎，致使比利時或英國等地的窯場起而仿效，燒製類似的作品。但另一方面，萊茵地區的窯場似乎也接受訂製，故傳世的不少鬍鬚男樣式酒壺上的貼花紋章內容，除見有英國、丹麥或奧地利等國王室家徽，還可見到科隆甚或荷蘭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徽(前田正明，一九八〇；David Gaimster, 1997)。

就我所能掌握的資料而言，這類裝飾有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傳世不只一件，彼此的相對年代也不相同，其既包括十六世紀中期(圖二七)、十六世紀後期的作品(圖二八)(Keramikmuseum Frechen, KFA95 (1560), KFA242

(1594))，也有可晚到十七世紀早中期的例子。不過，由荷蘭Texel出港卻在一六六四年失事沈沒於蘇格蘭北部雪特蘭(Shetland)的荷蘭東印度公司Kennemerland沈船，則打撈出裝飾有和熱蘭遮城遺址標本紋飾幾乎完全一致的鬍鬚男鹽釉酒壺(William A. Forster and Kenneth B. Higgs, 1973)(圖二九)。從而可知，熱蘭遮城遺址出土阿姆斯特丹市徽殘片上方原應有王冠形飾。另外，



圖二八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 1594年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圖二七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 1560年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圖三十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  
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現藏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之飾有阿姆斯特丹市徽的作品，其市徽周邊之細部裝飾圖紋亦和 *Kennemerland* 沈船以及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同類標本的紋飾一致（圖三十）；從神戶市立博物館藏品壺口沿部位由歐洲金工師所裝鑲的具有時代風格的金屬壺蓋看來，學界推測該鹽釉壺應係一五九〇—一六二〇年間萊茵瓷場售往荷蘭的典型作例（櫻庭美咲，一九九三）。此一年代觀，亦可做為訂定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同類標本的年代參考依據。

本文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補助《探索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陶器》（94-2411-H-002-024）專題研究計劃之部分成果，特此申謝。

#### 引用書目

- 一. 大橋康二等，〈インドネシア・パ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八二（一九九九）。
- 二. 中里逢庵，〈南海から出土する古唐津—三島唐津と二彩唐津—〉，《陶說》六四五（二〇〇六）。
- 三. 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江戸、長崎、アムステルダム、ロンドン、ニューヨーク〉（東京：東京都歴史文化財團等，一九九六）。
- 四.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護岸石垣復元事業に伴う發掘調査及び工事報告書一》（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二〇〇一）。
- 五. 前田正明，〈西洋陶磁物語〉（東京：講談社，一九八〇）。
- 六. 盧泰康，〈澎湖風櫃尾荷據時期陶磁遺物之考證〉，《故宮文物月刊》一九卷五期（二〇〇一）。
- 七. 櫻庭美咲，〈江戸時代に舶載されたライン炆器酒器について—試論—〉，《武藏野美術大學研究紀要》三〇（一九九九）。
- 八. 櫻庭美咲，〈鬍德利〉，《國華》一二九五號（二〇〇三）。
- 九. 《特別展 阿蘭陀—鎖國下エキゾチスム—》（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一九九六）。
- 〇. David Gaimster, *German Stoneware 1200-1900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7.
- 一. G. C. 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 二. Hasan Muarif Ambary, *Excavation Report at Pasar Ikan, Jakarta*,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81.
- 三. Jan M. Baart, 〈アムステルダムの歴史と考古學〉，收入：小林克編，〈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日蘭出土資料の比較—〉（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二〇〇二）。
- 四. Karl Göbels, *Keramik-Scherben aus Frechen Zusammengekehrt und Aufgelesen von Köln*, 1980.
- 五. Keramikmuseum Frechen, [www.rheinische-keramik.de](http://www.rheinische-keramik.de).
- 六. M. L' Hour and L. Long, "The wreck of an 'experimental' ship of the 'Oost Indische Companie': The Mauritius (1609)," *Nautical Archaeology*, 19-1 (1990).
- 七. Marion Merse, "Die Erfassung von Frechener Keramik am Beispiel des Ofenkomplexe Broichgasse," *Ausgegraben, Keramik aus Frechen von Mittelalter bis zum 19. Jahrhundert*.
- 八. Robert Stenuit, "Early Relics of the VOC Trade from Shetland: the Wreck of the Flute Lastdrage lost off Yell, 1653," *Nautical Archaeology*, 3.2 (1974).
- 九. William A. Forster and Kenneth B. Higgs, "The Kennemerland, 1971, An Interim Report," *Nautical Archaeology*, 2.2 (1973).